

明清秘密教门 洪武研究

孟超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明清秘密教门沿革研究

孟超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秘密教门滋蔓研究/孟超著.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211-05939-3

I. 明… II. 孟… III. ①宗教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②宗教—教派—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7838 号

明清秘密教门滋蔓研究

MINGQING MIMI JIAOMEN ZIMAN YANJIU

作 者：孟 超

责任编辑：史霄鸿

出版发行：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211@fjpph.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350001

印 刷：福建省金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福飞路江厝路 5 号 邮政编码：350013

开 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5.125

插 页：2

字 数：12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书 号：ISBN 978-7-211-05939-3

定 价：1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言

孟超博士的专著《明清秘密教门滋蔓研究》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数年来的不断修改、完善而成。秘密教门在我国源远流长，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弥勒教和大乘教。不过那时是作为佛教的异端教派而存在的。宋元时期，各种异端教派继续存在，而且在流传过程中互相渗透与融合，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洗礼，这些异端教派逐渐融合与演化为带有宗教性的民间秘密结社——秘密教门。

早在秘密教门的前身——异端教派时期，这些组织就被正宗佛教贬称为“邪教”，秘密教门形成后，除了元初一个短暂时期外，历代政权均将其称为“邪教”或“左道惑众”团体，加以打压，教门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成为在民间，尤其是下层社会流传的秘密组织，因此也被称为“民间宗教”或“秘密宗教”。

明清时期，各种名目的秘密教门大量涌现，成为当局潜在或公开的威胁，因而通过武力镇压或利用法律武器进行惩处。

如何看待秘密教门，一直存在争论。民国年间，学者们大多沿袭清代官方或封建文人的看法，将秘密教门仍视为“邪教”加以挞伐。新中国建立初期，历史学界摒弃了贬低、诋毁农民起义的做法，开始对秘密教门及其造反活动重新认识：农民战争史学者，将其纳入农民起义的范畴，称其为“农民革命组织”；宗教

史学者，则将其纳入宗教史范畴，称之为“民间宗教”或“秘密宗教”；社会史学者，则将其视为带有宗教性的民间秘密结社，称为秘密教门；政法工作者，又因其同民国以来的会道门多有渊源关系，并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而将其视为与会道门同样性质的反动组织。

正是人们的视角和出发点不同，导致在如何看待秘密教门的性质与社会功能、历史作用，以及历代政权对待秘密教门的政策方面出现分歧。认为秘密教门为“农民革命组织”和“宗教组织”的学者，较多肯定其光明面，较少涉及其阴暗面，对于历代政权对秘密教门的镇压和打击，则予以严厉谴责；政法工作者，因为将秘密教门等同于会道门，主要看到其阴暗面，故对于历代政权的打压政策，给予较多的肯定；社会史学者，将其视为带有宗教性的民间秘密结社，认为秘密教门乃是旧中国社会矛盾的产物，其基本群众乃是下层百姓，因此主张既要看到其在旧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也要看到其本身的消极方面。对于历代政权的打压政策，也应该客观地加以分析，总结其成败得失，不应仅仅加以谴责，一概否定。

孟超的博士论文《明清秘密教门滋蔓研究》正是从社会史的角度看待历史上的秘密教门和历代政权的治理政策，并进而探讨了秘密教门在历史上屡禁不止的原因。作者一方面肯定了秘密教门的正面功能，如在平时，通过宣讲其“教义”，向信徒灌输其教主乃是“救世主”，入教后在劫难来临时可以得到“无生老母”的拯救，给苦难无助的穷苦百姓以精神上的某些慰藉。社会矛盾激化时，则发动信徒和其他百姓起来反抗封建统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指出秘密教门的诸多消极方面，如一些教首平时利用传徒敛钱渔色，社会矛盾激化时，则利用虚妄的谎言，鼓动

群众起来造反。而造反的目的却并非为了解除信徒的现实苦难，而是为了推翻封建的世俗政权，建立以其教主为首的封建神权统治。封建的神权统治，对于人民群众的剥削与压迫比之封建世俗统治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更加不利于中国历史的发展。

既然封建的神权统治比封建的世俗统治更加反动，那么，历代政权对于秘密教门的打压政策也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封建统治阶级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他们对秘密教门的打压和对教门造反活动的镇压，当然无法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尽管封建统治者，通过武力镇压和施之以严刑峻法，秘密教门却仍然屡禁不止，依然在民间秘密流传，而且不断发展、蔓延。

本书的现实意义也是非常明显的。

以往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新中国建立后，已经铲除了秘密教门、会道门生存的土壤，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全国范围取缔会道门以后，各种名目的会道门组织，均已经销声匿迹，不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构成威胁。而 20 世纪末邪教组织“法轮功”的出现，却给人们敲起了警钟。事实证明，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期阶段，都仍然存在包括秘密教门、会道门和其他邪教生存的土壤，一旦气候适宜，这些非法组织就会破土而出，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和谐因素，甚至对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威胁。因此，探讨和总结历史上秘密教门屡禁不止的原因，提高人们对秘密教门、会道门及邪教的警觉，对于维护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作者孟超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习认真、刻苦，为了撰写博士论文，不仅查阅、使用了大量的档案史料，研究了大量的教门经卷，而且勤于思考，敢

于创新。我作为孟超昔日的导师和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在本书即将付梓时，自然感到由衷的喜悦，希望孟超在今后继续努力，撰写出更多的佳作，以飨读者。

秦宝琦

2009年4月于北京回龙观寓所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性质与历史渊源	(23)
第一节 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性质	(23)
第二节 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历史渊源	(33)
第二章 明清秘密教门的教义、教规及组织结构	(43)
第一节 入教仪式和教义、教规	(43)
第二节 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信仰体系	(46)
第三节 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教阶制度与统治模式	(52)
第三章 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滋蔓发展（上篇）	(62)
第一节 明代秘密教门的滋蔓与当局的查禁	(63)
第二节 明代主要秘密教门	(72)
第三节 明代秘密教门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	(88)
第四章 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滋蔓发展（下篇）	(91)
第一节 清初秘密教门的流传与反清活动	(91)
第二节 康乾时期秘密教门的发展蔓延	(95)
第三节 嘉道时期的秘密教门与当局治理措施的调整	(101)
第四节 清代主要秘密教门	(103)

第五章 明清时期秘密教门屡禁不止的原因	(122)
第一节 明清时期秘密教门发展蔓延的环境	(122)
第二节 下层群众的需求——秘密教门长期存在的基 本前提	(126)
第三节 教主创教的原动力	(130)
第四节 传教手法	(134)
第五节 教首对信徒的精神控制	(142)
第六节 统治阶级治理对策的失误	(144)
第六章 如何看待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起事	(149)
结语 历史上的秘密教门与当代邪教的异同	(153)

绪 论

一、国内外有关本课题的研究概况

中国历史上的秘密教门（有些学者亦称之为“民间宗教”或“秘密宗教”）源远流长，曾经在民间流传广泛，并形成一股强大的、不可忽视的势力。秘密教门的教首利用一般下层群众的祈福避灾、寻求神灵保护的心理，以迷信为纽带，拉拢群众结成秘密团体，也就是秘密教门，进行政治经济活动，这种结社组织大多采取“夜聚晓散”的活动方式，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尤其是明清两朝，发展相对成熟的秘密教门广为蔓延，屡禁不止，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以至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一次重大事件，我们都能在其中看到它的踪影。因此，秘密教门为中外学者所瞩目，对其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

秘密教门从出现到今天，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在不同的时期，人们会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它，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对秘密教门的研究，可以分成下面几个阶段：

（一）时人从政治上关注秘密教门

秘密教门既然对历史活动进程产生影响，必然会引起时人的

关注。尤其是在秘密教门异常活跃的清代，不少封建官吏和文人，从“资政”、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稳定的立场出发，对秘密教门（他们称之为“邪教”、“邪匪”）进行研究。比较著名的有嘉庆年间的严如煜和道光年间的黄育楩。严如煜曾直接参与了嘉庆年间清廷镇压白莲教起事，著有《平定川楚陕方略策》，为清最高统治者出谋划策。白莲教起事被平定之后，他所编写的《三省边防备览》一书，收录了清廷在镇压起事过程中臣僚们的奏疏，实际上是对镇压这次起事的经验总结。他在论述秘密教门教众的来源时，明确地提出：自康雍朝开始，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多，朝廷政策鼓励当地地主的土地兼并，使得本来就地少人多的省份出现大批无业流民，他们为生计，不得不向地广人稀地区迁移。到了乾嘉年间，这种状况愈发严重，仅在川楚陕交界的南山、巴山老林地区，就聚居着数百万计的“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①。加入秘密教门的人员，除了外省到蜀的流民以外，还有四川当地的破产农民、纤夫、小商小贩和散兵游勇。其中的纤夫，四川就有几十万之多。这些纤夫终年艰辛劳作于长江、嘉陵江，温饱却得不到保障。他们中的许多人为生计不得不卖光衣物，成为彻底的无产者，“弱则为乞丐，强则入咽匪伙党”^②。所以，根据严如煜的判断，秘密教门成员的主体，不是什么胸怀“反清复明”大志的仁人志士，而是“无赖恶少”^③，即破产的劳动者和无业游民。

另一位对秘密社会颇有研究的是官吏黄育楩，他认为：“严

①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

②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五。

③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

禁邪教而不将邪经中语详为辩驳，民既不知邪经之非，自不知邪教之非，虽尽法惩治，而陷溺已深，极难挽救。”^①因此，在其任内专门搜集、整理和研究秘密教门的经卷。为配合对白莲教等秘密教门的镇压，黄育楩对搜缴来的秘密教门数十种经卷进行了仔细研究推敲，并加上自己的反驳，编成《破邪详辩》三卷、《续破邪详辩》一卷、《又续破邪详辩》一卷和《三续破邪详辩》一卷。

在《破邪详辩》中，黄育楩根据破案所搜获的几十种秘密教门经典，总结出以下一些内容：

- (1) 几乎所有的秘密教门都以“八字真言”相号召，即“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个字。这里所说的“真空”，是依佛教的“四大皆空”而来；“无生父母”之意为：秘密教门教徒都是无生父母的儿女。故只要身为教徒，死后就可升到无生父母居住的天宫。“无生父母”又称为“无生老母”。
- (2) 所有秘密教门无一例外的都“敛钱上供”，借此怂恿一般民众求福免祸，按所供钱物的多少来定福善的厚薄。
- (3) 秘密教门上供时，有时兼行上表，就是说只要上表给无生父母，报告自己的名字，将来就不会耽误升天的时间。
- (4) 秘密教门经典中，并不直接谈谋逆，谋逆之原因为秘密教门利用经典聚众。
- (5) 秘密教门宣扬“红阳劫尽、白阳劫起”，谓红阳劫为释迦掌世，白阳劫为弥勒掌世。
- (6) 秘密教门除十二时外，又加纽、宙、唇、未、酬、刻等

^① 黄育楩：《破邪详辩》序，载《清史资料》（三），第4页，中华书局，1982年。

六时，共为十八时。

(7) 秘密教门以天上事煽惑一般民众，因天上事无法考证，这可说是秘密教门传教的高明手段。

(8) 秘密教门还经常提到转世之说，但和佛教的转世完全不同，为的也是煽惑民众。

封建社会的官吏和文人，对秘密教门屡禁不止的原因和镇压秘密教门造反活动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教门经卷中威胁到封建统治的内容加以批驳，虽然都是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定，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历史上的秘密教门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黄育楩的著作现已成为研究清代民间宗教、秘密结社及民间信仰的珍贵文献。

到了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也开始关注秘密教门。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从反清的立场出发，认为白莲教等秘密教门乃是“具有左右全国之势力”的“反对政府的二大秘密团体”之一，试图利用秘密教门，使之成为推翻清政府的重要力量。自1895年兴中会成立以来，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党人把推翻清政府的想法付诸实际行动，可革命党人手中没有兵权，迫切需要寻找一支破坏力相对强大、又甘愿为革命党人冲锋陷阵的现成力量。因此，当时在社会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秘密教门便成为了革命党人最佳的选择。但是，秘密教门以往的活动一般都具有很强的功利和迷信色彩，再加上清朝统治者的长期负面宣传，革命党人必须对秘密教门的活动重新评价，这不仅是给革命党人找出利用秘密教门的合理说辞，也能激励秘密教门成员的士气，使之心甘情愿为革命党人的反清斗争赴汤蹈火。例如，革命党人陶成章为了说明中国的秘密教门和反清有不可分割的渊源，撰写了著名的《教会源流考》一书。在书中，陶成章把白莲

教等教门说成是“民族革命团体”，并指出白莲教创教的本意“在驱逐蒙古，虽借宗教为惑人之具，而其间实含有民族主义也”^①。以陶成章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秘密社会的研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一反封建官吏和御用文人把秘密教门视为“叛乱”和“邪匪”的宣传，将人们的视野带进一个新的境地，第一次正面肯定了明清时代的白莲教等秘密教门的积极意义。

（二）从学术角度研究秘密教门的尝试

民国年间，一些学者把学术研究与政治热情分开，开始从新的角度研究秘密教门。陶希圣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秘密教门，强调了社会经济因素是造成秘密教门蔓延和造反的重要原因。他在《明代弥勒教白莲教及其它“妖贼”》一文中就指出：“在这样的‘人吃人’的、财政的、经济的重重剥削之下，贫苦的民众到处蜂起。他们在喇嘛教、儒教的统治者压迫的底下，也采取宗教的形式，反抗起来。”所以，“白莲教会的暴动，是反抗豪绅的运动，所以容易起事了”。^②

有的学者把秘密教门纳入宗教史或宗教学的范畴进行研究，将秘密教门称之为“民间宗教”或“秘密宗教”。这方面的研究，当首推李世瑜先生。他于 20 世纪 40 年代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通过进行田野调查研究秘密教门。他在河北省万全、怀安和张家口等地，对当地流传的黄天教、一贯道、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等秘密教门进行了历时数月的实地考察，搜集到大量有关秘

①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见《陶成章集》，第 415 页，中华书局，1996 年。

② 陶希圣：《明代弥勒教白莲教及其它“妖贼”》，载《食货》杂志，第 1 卷，第 46~52 页。

密教门的珍贵资料，写出了题为《现代华北秘密宗教》的论文。后来又著有《宝卷新研》和《宝卷综录》两部著作。

这样的研究方法对于秘密教门的研究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研究突破了传统的模式，借鉴、引入了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突破了以往封建史学把秘密教门视为“教匪”、“叛逆”的传统观念，把秘密教门作为科学的研究的对象；学者不再是仅仅利用档案和官方文件，而是深入到秘密教门中间掌握第一手资料；而最重要的，就是学者开始以历史的角度，对秘密教门进行研究而不带其他政治色彩和偏见。

此外，故宫博物院曾把清档中一些重要秘密教门，如老官斋教、红阳教、青阳教等的史料，编入《史料旬刊》，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

新中国成立之初，学者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对农民起义的研究成为热点。但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左”的思想对学术研究的干扰越来越大，历史上所有的反抗执政者的造反活动，不管是农民或是盗匪，统统被认定为“历史前进的动力”。秘密教门及其造反起事也被整体拔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秘密教门被誉为“农民革命组织”或“革命的宗教”、“农民的宗教”、“劳动人民的宗教”。有的学者更提出，农民不仅创造出自己的宗教，而且提出了对于政权的要求，因此这种行为是一种“农民革命”，认为不论是秘密教门还是帮会，他们的活动都有反抗封建统治，反对君主政权的功能，所以他们这些活动再有落后性，也值得歌颂和弘扬。肯定秘密教门及其造反活动在封建社会正面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观点的提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秘密教门研究的深入，但因其将农民起义的作用无限夸大而失去了历史研究的意义。因此，在那个年代，是不可能探讨明清秘密教门滋蔓和屡

禁不止的真正原因的。

(三) 研究的深化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彻底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开始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20世纪 80 年代以后，有一大批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秘密教门的论著问世。1981 年，喻松青教授发表了《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信仰和秘密结社》一文。后来，她又对明清时期的其他教门，例如黄天教、清茶门教、天理教、长生教等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汇集成《明清白莲教研究》一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 1987 年出版。这本著作收录了作者从 1980 年到 1985 年撰写的 12 篇有关秘密教门的研究论文，多有创见。例如，《明清白莲教研究》、《明代黄天教新探》、《清茶门教考析》系统地对白莲教、黄天教和清茶门教这几个重要教门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研究；而《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中的女性》、《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中的孝亲观》和《关于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等几篇论文，则是对一些具体问题做了有益的探索，很多是填补空白之作。马西沙教授的《清代八卦教》一书，则对华北地区的重要教派八卦教进行了个案研究，介绍了八卦教的起源、演变以及组织、教义、仪式、教规等。后来，马西沙先生又与韩秉方先生合作，于 1992 年出版了《中国民间宗教史》一书，全面、系统地对中国秘密教门的源流及各个教派的发展脉络、教义等内容加以研究。作者在前言中写到，中国不仅有一部道教史、佛教史，也还有一部变幻莫测、扑朔迷离、盘根错节、源远流长的民间宗教发展史。他们认为，民间宗教属于下层文化系统的一个方面，但又与上层统治思想关联颇深，它既属于底层文化系统中的一环，又是整个民间信仰的有机组成。

部分。^① 民间宗教与正统宗教虽然存在着质的不同，但差异更多地表现在政治范畴，而不是宗教本身。“就宗教意义而言，民间宗教与正统宗教之间没有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邪教’也是宗教，仅仅是不符合封建统治秩序的宗教”^②。在作者看来，“它的存在是合理的，而且是值得同情”。这部一百多万字的著作，并没有太多内容涉及秘密教门蔓延与屡禁不止的原因。1991年，濮文起先生在他的专著《中国民间秘密宗教》里认为明清时代的民间秘密宗教就是白莲教，各种教派全部是白莲教的分支。李世瑜先生在为此书所撰写的序言中认为：“在中国下层社会，人民还不断创造着自己的宗教，它们与统治者的宗教截然有所分野但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因为他们曾经吸收过不少统治者的宗教中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从而丰富了他们自己的宗教，他们的宗教就是流传在民间的千百种名目的秘密宗教。”^③ 该书主要论述了白莲教的渊源及发展脉络，也没有详细谈到中国秘密教门蔓延与屡禁不止的原因。

几乎与此同时，又有一批学者开始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研究，把中国秘密教门纳入民间秘密结社史的范畴，称之为秘密宗教结社或者秘密教门、会道门。在中国，首先从这个角度开展研究的是蔡少卿先生。他所撰写的《中国秘密社会》一书，对中国历史上的秘密社会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认为包括秘密教门在内的秘密社会在中国长期存在，“除了社会原因，还与它们自

^① 马西沙、韩秉方著：《中国民间宗教史》，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② 同上书，第3页。

^③ 濮文起：《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第1~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